亞歷山大帝國的政策及其問題

黃 俊 傑

一、序論：研究史的回顧與問題的提出

在世界史及古代希臘史上，亞歷山大（Alexander the Great, 356-323 B. C.）東征及其帝國之建立係一極具劃時代意義之歷史事件。西元前三三八年八月卡羅尼亞之役（Battle of Chaeronea）馬其頓王腓力（Philip II, r. 359-336 B. C.）一舉而臣服希臘城邦，奠定馬其頓崛起之初基。西元前三三六年腓力遇刺，亞歷山大繼位，旋即一統希臘世界，並於西元前三三四年春季率軍跨海東征，擊潰波斯帝國，轉戰歐亞，建立一雄跨三洲之大帝國，至西元前三二三年六月十日逝世，此十一年之間實爲人類史上旋乾轉坤之時刻。亞歷山大帝國之建立在世界史上之重要性至少可就以下三端觀之：㈠亞歷山大帝國之建立使古代世界往來較少之歐、亞、非三大單元融鑄爲一整體。在亞歷山大之前，歐亞非各有其獨特之政治傳統，地中海世界以民主政治見長，亞洲之波斯帝國則以專制王權著稱，而埃及則以其官僚制爲基礎之王國稱勝；亞歷山大出而將三者合而置於其一統帝國治下，取波斯省長制、埃及官僚制與希臘政治之舊規模而兼容並蓄，將各地之文化風俗融爲一爐而冶之，遂下開此後政治之新局面、塑造文化之新面貌，此其一；㈡亞歷山大之東征及其帝國之建立代表古代東西兩大世界長期爭衡中西方支配東方之一高潮。自荷馬史詩時代特洛戰爭（Trojan War）以降，東西之爭一直爲古史發展之一大主題，亞氏東征代表一高潮之出現，直至第七、八世紀之交阿拉伯人崛起入侵歐洲，爲「鐵槌」查理（Charles Martel）敗於都爾（Tours）此一歷時千載之東西之爭始暫告一段落，此其二；㈢亞歷山大帝國之建立代表人類史上時代最早規模最大的世界帝國之出現。論者嘗指出，世界古史之發展可大別爲以下之階段：氏族制度時代——都市國家時代——領域國家時代——大帝國時代。[1] 此一分期方式之細節及其在各地區歷史之適用性固仍有待進一步商榷，然就希臘史演進之立場言，則仍可見其有效性。銅器

[1] 參看：宮崎市定著，世界史序說，收入：**アジア史研究第二**（京都：同朋舍，一九七四），頁一～三十六；氏著，**アジア史概說**，緒論（東京：學生舍，一九七三）；氏著，**中國古代史概論**（ハーバード・燕京・同志社東方文化講座委員會，一九五四）。此文亦收入：氏著，**アジア史論考**（上卷）（東京：朝日新聞社，一九七六），頁一三一～一六三。這種分期方式乃上承內藤湖南而進一步發展。宮川尙志氏曾將內藤理論對宮崎氏及其他學者之影響作深入之分析，參看：Hisayuki Miyakawa, "An Outline of the Naitō Hypothesis and It's Effect on Japanese Studies of China," *Far Eastern Quarterly*, XIV:4 (Aug., 1955), pp. 533-552, esp. 543ff.

時代（3000-1200 B. C.）及黑暗時代（1100-800 B. C.）之希臘可視爲氏族制度之時代，古典時代（776-479 B. C.）之希臘係典型之都市國家時代，西元前第四世紀城邦內訌、各自爲政，互爭霸權，乃領域國家之時代；至亞歷山大出而峯迴路轉，城邦爲大帝國所取代。此一大帝國之出現於世界史上爲最早，特具歷史意義，此其三。

再就希臘古史之立場言，亞歷山大帝國之出現亦具有特殊之歷史意義：㈠古典時代希臘城邦以「自給自足」(autarkéia) 爲其理想，各城邦大致維持一獨立自主之局面，自亞歷山大帝國之新局面出現，舊日城邦獨立之局面瓦解，統一王權建立，故亞歷山大實爲自獨立走向統一之一重要橋樑，此其一；㈡古典時代希臘各城邦規模小，人口少，小國寡民易行民主政治，迨亞歷山大一統希臘世界，因帝國之規模宏濶，廣土衆民之局面須導之以專制齊之以集權，故亞氏實代表希臘古史自民主走向集權之轉捩點，此其二；㈢就思想史之立場言，古典時代之希臘人頗沾城邦之世界觀，不僅嚴於希臘人與野蠻人之分，而且各城邦羣體意識亦極濃烈。迨亞歷山大出而一統之局成，混同政策（policy of fusion）實施，天下一家理想落實，城邦世界觀至此而爲世界帝國世界觀所取代。故亞氏直可視之爲此種思想上移商換羽之分水嶺，此其三；㈣自文化史之視野觀之，古典時代之希臘文化（Hellenic culture）極具同質（homogeneous）之性格，各城邦文化之小異不掩其大同，然希臘化文化（Hellenistic culture）則較具異質（heterogeneous）之色彩，融各種文化傳統之特質於一爐而冶之，政治一統之局並不妨文化之多樣性與繁複性，此種希臘化文化之發展始於亞歷山大之東征，止於西元前一五〇年希臘羅馬文化之合流，而亞氏實爲物換星移之際之接筍點，此其四。

亞歷山大及其帝國在世界史及古希臘史之重要性既如上所述，則其人其事成爲千百載以降史家鑽研之對象自爲不足驚異之事。然史家論述亞歷山大皆以其生活經驗及其思想或時代背景爲基礎，故其心目中之亞歷山大及其帝國之影像每因人而變，境隨心轉，極富主觀性與時代性。遠之如西元第二世紀之史家亞利安（Arrlan. 95?-175? A. D.）與蒲魯塔克（Plutarch, 46?-126? A. D.）對亞歷山大之看法不啻南轅北轍，[2] 近之如二十世紀以降歐美諸大家對亞歷山大之研究結論亦有甚大之出入焉。擧其著者如唐恩（W. W. Tarn）氏對亞歷山大之研究，[3] 視亞歷山大爲世界之推動者，並以爲亞歷山大乃人類史上第一個四海之內皆兄弟（Unity of Mankind）爲其畢生理想的人，此爲思

---

[2] 參看拙作，「西元第二世紀史家對亞歷山大的看法」，收入：拙著，古代希臘城邦與民主政治（臺北：學生書局，民國六十七年八月增訂再版）。頁一五七～一九七。

[3] W. W. Tarn, "Alexander: The Conquest of Persia,"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27), VI, Ch. XII, p. 437; idem, "Alexander the Great and the Unity of Mankind,"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19, (1933), pp. 123-166; idem, *Alexander the Grea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8) II, p. 400.

想史上極大之革命。唐恩氏係一訓練有素之名律師，彼廣蒐史料證成上述論點，爲文極稱雄辯。唐氏後因健康欠佳而退隱山林，彼因家道富裕，頗富貲財，故能旅遊倫敦蒐集資料，專事著作而不須仰賴教職爲糊口之資。然此種生活背景每不知不覺中投影於其亞歷山大研究之中，近人嘗譏唐氏筆下之亞歷山大實不啻一英國紳士也。唐氏筆下之亞歷山大雖係一過份理想化之影像，然其所著**亞歷山大**（*Alexander the Great*，一九四八年問世）一書[4] 仍代表亞歷山大研究之一重要里程碑。粟野賴之祐對亞歷山大之看法基本上與唐恩氏之見近似，粟野氏指出亞歷山大採用波斯宮庭俯伏崇拜禮之原因乃是爲了實現人類統一之理想，而亞歷山大此種人類一體之意識實已自其參拜亞蒙（Ammon）神並以亞蒙神之子自居啓其端倪。[5] 福勒（J. F. C. Fuller）氏之**亞歷山大傳**[6] 則指出，亞歷山大突破了希臘世界之基本觀念而建立了一種新的世界觀，混融歐亞文化。亞歷山大之中心思想卽爲建立一個一統社會使人類皆立於兄弟之地位。福勒氏並推崇亞歷山大此一夢想較其征服偉大。此一看法與唐恩教授之說相近。以上三氏對亞歷山大史事之解釋皆尅就其理想面著眼，塑像其理想化的亞歷山大影像。

當代學者治亞歷山大史事而取徑與以上偏重其理想面不同者則有伯恩（A. R. Burn）、貝廸安（E. Badian）及威爾肯（Ulrich Wilcken）三氏。伯恩氏著**亞歷山大與希臘化帝國**[7] 一書，較重其現實面，伯氏筆下之亞歷山大爲一優越之將領及强有力之政治領袖。伯氏以爲亞歷山大實無天下大同之理想，其眞正之成就僅止於拓展希臘文化之影響力於東方而已，然其行動却反使希臘文化日趨下墜而未能發展至登峯造極之境，終至拱手讓於羅馬人。事之可哀者莫過於此。

貝廸安氏對亞歷山大之解釋基本上與伯恩氏同一步調，以爲亞歷山大並無如唐恩氏所云之世界觀，亞氏係一個實際主義者，以尋求廣大之王國、鞏固一己絕對統治之權力爲目標。亞歷山大旣無意於成爲諸國協之領袖，亦未嘗措意於全人類之統一，其帝國之統治尤帶機會主義之色彩。[8]

---

[4]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8.

[5] 參看：粟野賴之祐著，「B.C. 324年ヘラス聯盟定期總會とアレクサンドロスの君主禮拜制確立の研究」，**史學雜誌**，四四：八（一九三三），頁九三一～九七三；四四：九，頁一一三〇～一一七六；氏著，「アレクサンドロスのアムモオン參拜行と世界意識，全人類の同胞の觀念の誕生に就いて」，**史學雜誌**，四七：三（一九三六），頁三四一～三五八；四七：四，頁四六三～四九九；四七：五，頁五九七～六三〇；四七：六，頁七一一～七四六，尤其是頁七四二～三。

[6] J. F. C. Fuller, *The Generalship of Alexander the Great* (London, 1958),紐先鍾譯，**亞歷山大新傳**（臺北：軍事譯粹社，民國五十年）。

[7] A. R. Burn, *Alexander the Great and the Hellenistic Empire* (London. Teach yourself History Library, 1947).

[8] See: E. Badian, "Alexander the Great and the Unity of Mankind," *Historia*, VII (1958), pp. 425-444, esp. 432; idem, "Alexander the Great and the Loneliness of Power," in his *Studies in Greek*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威爾肯氏之**亞歷山大傳**[9] 則指出，亞歷山大基本上並未受任何高遠之理想或深邃的觀念之驅策，亞氏僅係對歷史境遇作理性的反應之歷史人物而已，此種客觀之歷史環境將亞歷山大逐步推向權力之最高峯。以上三氏論亞歷山大其人及其帝國皆特就其現實面，以亞歷山大爲一實際主義者，其說與側重理想主義面者立論循相背之二途，然其有助於吾人對亞歷山大史事之理解則殊無二致，相反乃所以相成也。

上文擇要回顧學界有關亞歷山大研究之業績，吾人所欲指出者乃是近人研究亞歷山大史事之著眼點似皆不出理想與現實之二途，且極具主觀性與時代性。本文寫作之目的，乃嘗試綜合前人之業績並在以上二途之外另闢蹊徑，擷取晚近政治社會學之若干觀點分析亞歷山大帝國之政策及其所遭遇之問題。

在人類歷史上，帝國如何而可以長治久安實爲一永恒性之問題。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之，此因「並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取與守不同術也」。[10] 職是，歷史上帝國的統治者莫不汲汲於維持其帝國之政治系統之均衡與穩定。晚近社會科學界對人類歷史上帝國的政治系統研究用力最深者首推埃森西塔（S. N. Eisenstadt）。埃氏以「文化的有機論」之立場析論歷史上帝國之發展，[11] 指出帝國的政治系統依緣於社會區分及符號系統之理性化以及新式政治領袖之發展者爲獨多。帝國的統治者爲求其政權之穩定，多著眼於「自由資源」（"free" resources，包括人力及物力資源）之推動與控制，並致力於帝國政治目標之實現。然則統治者上述之政治取向則又引起三種類型之衝突：一曰合法化（**legitimation**）與階層化（**stratification**）之衝突；二曰長程與短程政策之衝突；三曰主要階層之政治態度與活動之間之衝突。吾人試循埃氏上述之思路以尋繹亞歷山大帝國之史實，則可見埃氏所云三種類型之政治衝突中尤以第一及第二類型之衝突屢見於亞歷山大帝國，構成極堪注意之歷史現象。職是，下列問題乃亟待吾人追索：亞歷山大如何動員其帝國內之人力與物力資源？換言之，亞歷山大採取何種政策以維持其帝國之穩定？此種政策在其政權之合法化與社會階層化之間引發何種問題？在帝國之長程與短程目標之間又造成若何之矛盾？此種問題與矛盾對其帝國有何影響？本文即擬以上述問題爲中心分析亞歷山大帝國之發展。

---

and Roman History (New York, 1961), pp. 192-205; idem,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Empire," *Greece and Rome*, 2nd Ser., XII (1965), pp. 166-182, 此文已由何宛倩譯爲中文：「亞歷山大帝國的行政」，收入：王任光、黃俊傑合編，**古代希臘史研究論集**（臺北：成文出版社，民國六十八年四月）。

[9] Ulrich Wilcken, tr. by G. C. Richards, *Alexander the Great*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31, 1967).

[10] **史記**（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乾隆四年校刊本），卷六，秦始皇本紀第六，頁四十三，a。

[11] S. N. Eisenstadt, *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the Empir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Historical Bureaucratic Societie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3, 1969). 關於埃氏之理論，另詳拙作：「埃森西塔對帝國的政治系統之研究及其對中國歷史之解釋」，收入：拙編，**史學方法論叢**（臺北：學生書局，民國六十六年八月），頁二〇三～二二七。

二、亞歷山大的東征及其政策

西元前三三六年夏季腓力王被刺身死，亞歷山大卽位，此時的馬其頓「處境可以說是危險重重，强敵環伺。那些和馬其頓毗鄰的野蠻民族都不甘奴役，急於獲得他們本族的帝王的統治；在希臘方面，雖然腓力已經戰勝了希臘人，但是還沒有來得及完成他的征服工作，使他們死心塌地的服從他的統治，所遺留下來的完全是一個紛擾混亂的局面。」[12] 西元前第四世紀的希臘在政治上是一個混亂的時代，底比斯（Thebes）的霸權旋起旋滅，而波斯帝國則日趨末落，期待一個入侵者的出現。在文化上則雅典文化漸取得泛希臘文化之性格，[13] 此種文化之氛圍極有利於政治上大一統局面之出現。亞歷山大繼位之後，於西元前三三五年戡平希臘各邦，安排安提巴特（Antipater）留守，鞏固後方，乃於次年（西元前三三四年）率軍東征，四年（334-330 B. C.）征服波斯，三年（330-327 B. C.）戡平中亞，二年（327-325 B. C.）平定印度，至西元前三二三年六月十三日亞氏逝世之時，雄跨三洲的大帝國已於焉形成。

亞歷山大帝國疆域遼濶，據福勒氏之估計，帝國全部面積約二百萬方哩，約等於今日美國領土的三分之二，所統轄人口約有五千萬人。[14] 帝國領域內不僅自然條件差異極大，而且人種複雜，文化傳統各異，兼之以東西兩大世界歷時千載之文化偏見極深，伯利（J. B. Bury）氏嘗云：「亞歷山大一生都在克服各種政治及軍事的困難，但沒有一項困難是比建立一個既能消除東方偏見又能不觸犯西方偏見的王權更困難的了。」[15] 因此，如何有效地統治這個帝國乃成爲亞歷山大所面臨最嚴重的問題。

吾人細按亞歷山大帝國之政治措施，可尋繹出兩大顯而易見之政策。其一曰：多樣形式下的統一政策。就亞歷山大帝國開展之外部歷程觀之，亞氏由馬其頓王而爲科林斯同盟（Corinthian League）之霸王，而波斯帝國之大王，終至世界帝國之大帝，其間固自卑而高，變動不居，然此其間有一不變之原則在，此卽是整個帝國統一皆繫之於亞歷山大一人之身。[16] 尤有進者，亞氏遂行其一人統治有一根本原則，此卽是：多樣形式下之統一。亞歷山大爲帝國之最高權威，然此一最高權威則面對不同的被統治者而有不

---

[12] Plutarch, tr. John Dryden & Revised by A. H. Cloug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reprinted from the 1864 edition) 此書中之亞歷山大傳，以下簡稱爲 *Alex.* 此書部份之中譯本，參看，Plutarch 著，吳奚眞譯，**希臘羅馬名人傳**（上，下冊）（以下簡稱**名人傳**）（臺北：國立編譯館，一九六三）。本段引文見 *Alex.* p. 808；**名人傳**，頁一九一。

[13] Wilcken, *op. cit.*, p. 15.

[14] J. F. C. Fuller 著，紐先鍾譯，**亞歷山大新傳**，頁五四。

[15] J. B. Bury, *A History of Greece to the Death of Alexander the Great*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p. 771.

[16] Wilcken, *op. cit.*, p. 246ff.

臺灣大學歷史學術期刊資料庫

同的面貌：首先，對馬其頓舊部，亞歷山大係以腓力王繼承人之地位出現；其次，對參與科林斯同盟之希臘人，亞歷山大則是一個霸主，一個爲捍衛希臘傳統的自由價值而奮鬪的領袖，故西元前三三四年，格拉尼卡斯（Granicus）之役亞氏大敗波斯，即將虜獲之波斯盔甲三百具獻於女神雅典娜之前，並誌之曰：「腓力之子亞歷山大以及除拉西第蒙人（Lacedaemonians）之外的希臘人，謹獻這些從亞洲的波斯人處所虜獲的戰利品。」[17] 亞歷山大陣前誓師，亦以自由與奴役爲希臘人與波斯人之對照，並隱隱然以維護自由之責任自任。[18] 復次，對亞洲子民而言，亞歷山大則是以一個帝主，一個主子的姿態出現。例如亞氏接見賽西亞（Scythia）之使節時即以「全亞洲之王」（master of all Asia）自居，[19] 亞氏貽書大流士（Darius）即指令大流士必須稱他爲「全亞洲之王」[20]。以帝王之姿態面對亞洲乃是亞歷山大統一政策之另一面，在此一大原則之下，亞氏又適應各地不同之政治傳統而略作調整，如在埃及，亞氏以「法老」（Pharaoh）王化身之身份君臨臣下，在巴比倫（Babylon）則又以王而不是以神之姿態出現。

總之，亞歷山大帝國的統治基礎雖是建立於韋伯（Max Weber, 1864-1920）所謂「神性的權威」（Charismatic authority）之上，帝國的統治者每於生命的强度之中證明其能力，政治爭端之解決每訴諸於先知的啓示、神諭或超人的秉賦。[21] 但亞歷山大的王權實具有其多面性，此種納「多」於「一」、既重「全體」又不忽略「部份」之政治原則實爲亞歷山大帝國政策之最值吾人措意者。

其二曰：包容歧異的混同政策。亞歷山大之東征實懷有一高遠之文化理想，亞氏從其師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384-322 B. C.）處學到了對希臘文化的熱愛，根據普魯塔克的記載，亞里斯多德曾爲亞歷山大校訂**伊里亞德**（*Iliad*），此書伴隨亞氏東征西討，並在征服大流士虜獲一寶箱時收藏於此寶箱之中，亞氏對希臘史家與作家如費里斯塔（Philistus）、尤里披底斯（Euripides）、索福克里斯（Sophocles）、艾斯奇勒斯（Aeschylus）、德雷斯提（Telestes）、費洛克森納斯（Philoxenus）等人的作品均耳熟能詳。[22] 亞歷山大希望希臘文化的影響力隨其東征而往東拓展。換言之，使東方世界希臘化乃亞歷山大帝國一貫之文化政策。[23] 使此一文化政策落實之最具體的措施莫過於

---

[17] Arrian, tr. Aubrey de Selincourt, *The Campaigns of Alexander* (Penguin Books, 1958, 1971)（以下簡稱；*Anabasis.*）Bk. I: 17, p. 76; Plutarch 之記載與 Arrian 略同，參看：**名人傳**，頁一九八。

[18] *Anabasis.*, BK. II: 7, pp. 111-112.

[19] *Ibid.*, BK. IV: 16, p. 228.

[20] *Ibid.*, BK. II: 14-15, pp. 127-128.

[21] 關於韋伯對政治權威之分析及其所謂「神性的權威」的涵義，參考：Max Weber, tr. Talcott Parsons,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47, 1969), pp. 324-386.

[22] **名人傳**，頁一八八，二一〇。

[23] cf. Wilcken, *op. cit.*, pp. 256-258.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帝國境內各地亞歷山大城之建築。亞歷山大在其帝國內共建立大城七十有餘，[24] 皆名之曰：亞歷山大城。亞氏並躬身參與建築工程之設計規模等工作。[25] 這些新建的亞歷山大城均沾染極其濃厚的希臘文化色彩，均依希臘城邦之格局建設。

然而，亞歷山大欲拓展希臘文化之影響力於東方並非採取强制高壓之手段，而是運用極具彈性之混同政策（policy of fusion），融合東西兩大世界不同之文化因素於一爐而冶之。求混同然容許歧異，此爲亞歷山大帝國政策之另一特色。此一特色表現於服飾、行爲及思想三個不同層次之上。

先就服飾層言之，亞歷山大爲消除被征服者之屈辱感並減抑征服者之氣焰，乃在東征過程中採用波斯人的紫袍，放棄馬其頓人傳統的無袖外套，此點曾使西元第二世紀史家亞利安（Arrian）大表不滿，著文抨擊。[26]

再就行爲層面言之，亞歷山大至少有二項措施特值吾人注意。在社會行爲上，亞歷山大鼓勵希臘人與波斯人互通婚姻，他自己在蘇薩（Susa）時娶大流士之女斯泰蒂拉（Statira）爲后，並主持宴會慶祝希波通婚卽爲著例。[27] 此種通婚並爲馬其頓人帶來若干混血子女。[28] 其次，在帝國行政制度上，亞歷山大依各地之文化及政治背景，因其俗而簡其禮，儘可能作最少的改變，此尤見於其採用波斯之省長制（Satrapy），並以當地人主當地之政，例如在蘇薩起用波斯人亞布利玆（Abulites）出任蘇薩之省長，[29] 在埃及則起用埃及人多勞斯比斯（Doloaspis）及佩蒂西斯（Petisis）分任上下埃及之省長，[30] 在阿利亞（Aris）任命波斯人阿薩西斯（Arsaces）任省長。[31] 但亞歷山大對波斯之省長制並非毫無保留地全盤接受，他以分而治之的原則對省長制加以修正。整體言之，在帝國西部（如在埃及），亞氏常以民政之權授諸當地人而以軍事權授諸馬其頓人；在帝國東部（如巴比倫地區），則以波斯人任省長，而輔之以馬其頓人任監督官。[32] 亞歷山大帝國此種包容歧異的混同政策亦反映於其容納各族人種於其軍隊中[33] 以及征服蘇利（Soli）而保留其舊政府[34] 之措施中。

---

[24] 關於亞歷山大所建之城的數目，各家說法不一。此據浦魯塔克之說。見：Plutarch, tr. by several hands, corrected & Revised by William W. Goodwin, *Moral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870) p. 480.

[25] *Anabasis*, BK. III: 2, p. 149.

[26] *Ibid.*, BK. IV:7-8, pp. 212-213. 關於亞歷山大之採用波斯服飾，並參考：**名人傳**，頁二三二。

[27] *Alex.*, p. 850; **名人傳**，頁二五九。

[28] *Anabasis*, BK. VII:12, p.366-367.

[29] *Ibid.*, BK. III:16-17, pp. 147-50.

[30] *Ibid.*, BK. III: 5-6, pp. 154-155.

[31] *Ibid.*, BK. III: 25, p. 190.

[32] cf. Wilcken, *op. cit.*, p. 253.

[33] *Anabasis*, BK. III: 24, p. 188.

[34] *Ibid.*, BK. II:5-6, pp.108-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最後就思想層面言之，西元前三二七年亞歷山大決定採用波斯之俯伏崇拜禮（Prostration）乃係其征塵中最具思想史意義的史實。馬其頓的君主政體原是一種所謂「國家君主政體」（national monarchy），具有荷馬時代王權之特徵，但又與希臘城邦之共和政體不同。然此種王權至亞歷山大出而融合希臘、馬其頓及伊朗之王權特質於一爐而冶之。[35] 而這種新式君主政體之一大特徵卽是臣屬對君王行俯身跪吻之禮，此原係波斯宮廷之禮節[36]，不見於希臘之政治傳統[37]，亞歷山大採用此種東方禮節，其目的或係在於將馬其頓人與波斯人混同爲一[38]。此項措施是此後希臘化時代君主崇拜禮發展上最重要的起始階段[39]，亦是君權高漲之重要象徵。此一史實在思想史上之意義正在於它代表新舊思潮遞嬗之轉捩點，亞歷山大有見於帝國之平治必須容納東方之政治思想，遂毅然決定採行俯伏崇拜禮，亞氏之史臣考里塞尼斯（Callisthenes）則明辨人神之分際，力加反對，乃至於與亞歷山大反目交惡，終以身殉。[40] 此因亞歷山大有見於容納「異」於帝國的「同」之中，而考氏見不及此，眞所謂鷦鵬已翔於天際而戈者猶視夫藪澤者也。

綜上所論，亞歷山大帝國之政策之根本精神乃在於以「因是」之原則，在舊傳統的持續與新制度的變遷之中獲致一動態的平衡，在「一」與「多」、「異」與「同」之間求其穩定之發展，此爲其帝國之政治系統所賴以建立之重要基礎。在此種基礎之上，亞歷山大乃能有效地動員其帝國內部人力及物力之資源，開人類史之新紀元。然則，亞歷山大帝國內部因上述政策之施行亦引發不少問題，此種問題對希臘化時代政治史之發展具有決定性之影響，下文將分別探討此種歷史問題之所在。

三、亞歷山大政權的合法化與階層化之間的問題

亞歷山大的眼光是超乎時代的，他的行動是開創性的，他的歷史角色正如同人類史

---

[35] cf. F. E. Adock, "Greek and Macedonian Kingship," *Procees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XXXIX (1953), pp. 163-180.

[36] Herodotus, tr. Aubrey de Selincourt, *The Histories*, (Penguin Books, 1954, 1973), I, 134, p. 97. 亞歷山大採取這種禮儀完全係受波斯之影響。參考：Calvin W. McEwan, *The Oriental Origin of Hellenistic Monarch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4), esp. pp. 30-31.

[37] *Ibid.*, VII, 136, p. 486.

[38] 近人頗作如此主張，參考：J. P. V. D. Balsdon, "The 'Divinity' of Alexander," *Historia*, (1950), pp. 363-88, esp. 371ff. 並參考：大牟田章，「マケドニア王國の發展とアレクサンドロス」，收入：岩波講座世界歷史2，（東京：岩波書店，一九六九，一九七三），頁一六七。

[39] cf. Cuthbert Lattey, "The Diadochi and the Rise of King Worship,"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CXXVII, (July, 1917), pp. 321-334

[40] Arrian, *Anabasis*, IV, 9-13, pp. 217-223; Plutarch, *Lives*, pp. 840-1; 近人 T. S. Brown 對於亞歷山大與考里塞尼斯交惡事件之歷史意義闡發極精，參看：T. S. Brown, "Callisthenes and Alexander," *American Joural of Philology*, LXX: 3, (1949), pp. 225-48.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上任何一位劃時代的人物一樣，必須面臨種種新舊的衝突與矛盾。此種矛盾與衝突隨其東征而不斷明顯化，吾人首須注意者爲亞歷山大統治權合法化與其帝國內部社會階層化之間衝突之問題。

亞歷山大卽位之初其統治之合法性（legitimacy）原建立於傳統的基礎之上，近乎韋伯所謂「傳統的權威」（traditional authority），所以，亞氏繼其父爲馬其頓王，征服希臘各邦之後接受科林斯同盟諸邦之一致推舉而成爲總司令。[41] 然在其征塵中帝國的領域逐漸擴大，亞歷山大爲求使其統治權更穩固而無可置疑，必須使他自己成爲「神性的權威」，「天威不違顏咫尺」，使其政權之合法化建立在神性之上，其具體措施卽爲宣稱他自己係亞蒙神（Zeus-Ammon）之子。

關於亞歷山大朝拜阿蒙神廟之史實，今傳世史料所載雖小有出入，但大致相同。[42] 西元前三三一年元月，亞歷山大向亞蒙神朝拜，據說神諭告訴他說，他將成爲全世界的統治者，亞氏於是向亞蒙神奉獻祭品，欣喜而歸。此一史實之歷史意義正在於它爲亞歷山大之「神性的權威」奠定了基礎。蒲魯塔克嘗云：「亞歷山大自己顯然並不以天神自居，或者爲此有洋洋得意之感，他只是把他的天神身份當做促使其他民族臣服的一種手段而已[43]。」柯蒂亞斯（Curtius）記載則更說，亞氏離開神廟後，其部下曾詢問祭司他們可否崇拜亞歷山大，祭司答云亞蒙神說可以。[44] 如此看來，則亞蒙神之神諭對亞歷山大統治權之確立實有相當直接之關係。經過此一合理化之程序後，亞歷山大乃進而要求其部下及臣屬對他行俯伏崇拜禮，其地位直由人進而爲神矣。

然而，此種政權合法化之舉動却在其帝國內部引發極其嚴重之危機，此卽是來自亞氏的馬其頓舊部之强烈反對，遂引起了西元前三二七年考里塞尼斯（Callisthenes）被殺之慘劇。馬其頓人是亞歷山大帝國內部最主要的階層，是亞氏東征之主力，亞氏原係以希臘人之領袖自任，所以西元前三三四年亞氏大敗波斯，卽以希臘領袖之姿態獻祭於女神雅典娜之前。然自亞氏以亞蒙神之子而非以腓力之子自居之後，其地位之本質乃完全改變，亞氏從此已不再是人，而是一個神，所以其後乃進而要求其屬下行俯伏崇拜禮，此乃勢所必然之事。如此一來，亞歷山大乃自外於其希臘貴族，而與希臘舊部居於不同之地位，因而引發內部之衝突。此種政權合法化與社會階層化之間衝突之徵兆已微露於亞歷山大朝拜亞蒙神之行矣。

---

[41] 名人傳，頁一九四。

[42] 有關這段史實的史料如下：Arrian, *Anabasis*, BK. III: 3-4, p. 150ff; Plutarch, *Alex.* pp. 820-1, 中譯文見：名人傳，頁二一一～二一三；Quints Curtis Rufus, *History of Alexander*, tr. John C. Rolf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4. 7. 5-16, 25. 32; Diodorus Siculus, tr. G. Booth, 17. 49-51.

[43] Plutarch, *Alex.*, p. 821; 名人傳，頁二一三。

[44] Curtius, *History of Alexander*, 4. 7. p. 3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據柯蒂亞斯之記載，亞歷山大朝拜亞蒙神之後即自詡爲亞蒙神之子，此舉馬其頓人極不以爲然，因爲馬其頓人久習於王之統治而非神之統治，而且較其他民族享有更多的自由。[45] 此種衝突至西元前三二七年考里塞尼斯被殺之事件而完全明朗化。考氏係亞歷山大之史臣，亦是其師亞里斯多德侄女希羅（Hero）之子，他因拒絕對亞歷山大行俯伏崇拜之禮而與亞氏交惡，並力言在「尊崇一個人與崇拜一個神」[46] 之間應有明確之分際，終於爲亞氏所殺。[47] 近人對亞歷山大之採取俯伏崇拜禮之動機說法不一，或以爲純係基於政治之考慮，亞氏欲以俯伏崇拜禮爲完成其混同政策之一項工具，消弭希臘人、馬其頓人及波斯人之界限；[48] 或以爲此對亞歷山大心目中極度關心波斯人之問題，故不惜採用波斯禮節，不惜與馬其頓舊部及希臘人決裂；[49] 或以爲此舉純係爲軍事上之需要，因爲彼時亞氏在中亞戰役之中與部將之衝突日多，費羅塔斯（Philotas）、巴邁尼歐（Parmenio）及克萊塔斯（Cleitus）均被殺，亞歷山大決定放棄與其部將之親密關係——此種關係爲馬其頓王權之一大特徵——而代之以專制之王權。[50] 不論亞歷山大採用俯伏崇拜禮之動機如何，此種禮儀之採行乃基於其神性之淵源且對其政權之合法化有直接之作用乃爲一極其明顯之事實。亞歷山大欲强化其統治之合法性，則必須不斷透過各種具體政策之實施而强調其神性之淵源，然亞氏愈强調其神性，則去其希臘及馬其頓傳統愈遠，愈引起馬其頓舊部隊之反抗，終至引發無可協調之衝突。此爲亞歷山大帝國爲實行其統一及混同政策，採行神性的合法化之具體措施而引起的矛盾問題。

四、亞歷山大帝國長程與短程目標之間之衝突

亞歷山大自幼抱負不凡，以成爲大帝國之帝王自期許，熱中於功業與榮譽，接見波斯使臣則問以歐亞交通之途徑，聞其父腓力之勝利則不悅之色溢於言表。[51] 亞歷山大率軍東征，實有一長程之目標在。此一目標即是：混融歐亞，調和東西兩大世界建立一統之大帝國，使四海之內皆兄弟之理想落實。

然而，欲實現此一長程之目標，亞歷山大帝國必須維持二大政策之指導原則：其一曰，多樣型式下的統一；其二曰，包容歧異的混同政策。本文第二節已概略言之。在

[45] Loc. cit.

[46] Arrian, *Anabasis*. BK. IV: 11, p. 219.

[47] 關於考氏之死，尚有各種說法，參考：Plutarch, *Alex*. p. 841; 名人傳，頁二四五。

[48] W. W. Tarn, *Alexander the Grea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8), Vol. 1, pp. 78-82.

[49] Wilcken, *op. cit.*, pp. 168-171.

[50] C. A. Robinson Jr., "The Extraordinary Ideas of Alexander the Great"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62 (1956-1957), pp. 340-341.

[51] Plutarch, *Alex.*, pp. 803, 806; 名人傳，頁一八四。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亞歷山大東征之過程中，此二大政策原則均落實而成爲帝國之短程目標：消除被征服者的屈辱感而擴大帝國的政治基礎。

爲實現這項短程的政治目標，亞歷山大採取了一系列的具體措施。首先，在軍隊的編組方面，亞歷山大儘量將被征服者納入其軍隊之中。[52] 在亥克尼亞 (Hycarnia) 時，亞歷山大又對三萬名中亞男孩施以希臘式之教育，普魯塔克云：[53]

> 在這個時候，他使自己更加適應亞洲當地人民的生活方式，同時也促使他們儘量迎合馬其頓人的習俗，他以爲這種混淆融合會產生一種親善關係，使他在出征期間免去後顧之憂，這種作法當然要比使用暴力和强制手段爲佳。爲了達到這個目的，他還選拔了三萬名本地的男孩，教授他們希臘語文，並且訓練他們使用馬其頓武器。

其次，在對待被征服者的政策上，亞歷山大一直採取一種優容寵渥的政策，上文已談過亞氏爲消除征服者與被征服者之隔閡而採用波斯人之服飾、採用波斯宮廷之俯伏崇拜禮、採用波斯省長制。不僅此也，亞歷山大又進一步起用被征服者出任被征服地的行政首長，如上文所說在蘇薩起用波斯人亞布利玆任省長；在埃及起用埃及人分任上下埃及省長；在阿利亞任命波斯人阿薩西斯任省長，征服蘇利而保留其舊政府。[54] 征服尼薩 (Nysa) 而予當地人以自由與自治權；[55] 予亞利亞斯比人 (Ariaspians) 以自由；[56] 在巴比倫時，又任命波斯人馬查斯 (Mazeus) 爲總督；尤其是在印度戰役中，亞歷山大擊敗波拉斯 (Porus)，但是：[57]

> 亞歷山大不僅讓他以總督的名義繼續統治他從前的國家，而且還把他所征服的其他十五個獨立民族的土地——包括五十個大城市和無數的村落，劃歸他的治下。

凡此種種措施皆爲平息被征服者之屈辱感而採取者。亞歷山大爲了擴大其帝國之基礎，甚至於在西元前三二八年隆多征服索格地亞 (Sogdiana) 之阿克斯亞爾提斯 (Oxyartes) 之後，娶阿氏之女羅克莎納 (Roxana) 爲妻，婚禮依波斯習俗行之，阿氏乃立即向亞氏投降，並一同去圍攻悟里尼斯 (Chorienes)，亞氏並於攻下悟里尼斯任命阿氏爲當地之總督。

由上可見，亞歷山大爲完成其帝國之短程目標——擴大帝國之基礎，在其東征過程中一直採取各種措施以縮短征服者與被征服者之對立，此種措施頗能贏得被征服人民的

---

[52] Arrian, *Anabasis*., BK. III: 24, p. 188.

[54] Plutarch, *Alex*., pp. 834-835; 名人傳，頁二三四。

[54] 以上參考本文第二節。

[55] Arrian, *Anabasis*, BK. V:2, p. 256-257.

[56] *Ibid*., BK. III: 27, p. 193.

[57] Plutarch, *Alex*., p. 845. 名人傳，頁二五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民心。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當亞歷山大愈汲汲努力於完成其帝國之短程目標時，其帝國之長程目標之完成却又同時受到阻滯，此卽是由於亞歷山大之波斯政策所引起的馬其頓舊部向心力之削弱這個問題。

上文說過亞歷山大曾訓練三萬名波斯兒童以加入其軍隊，此事後來演變爲馬其頓舊部與亞歷山大衝突之直接原因。普魯塔克記載此事甚詳：[58]

> 從前他所留下的由專人加以教育的三萬名兒童，現在都大有進步，不僅身體健壯，儀容俊秀，而且在操練方面，也非常熟練而靈活，亞歷山大看了非常高興；但是那些馬其頓人却爲此而惴惴不安，因爲他們擔心國王會不像從前那樣重視他們了。後來，當國王要把病弱和殘廢的馬其頓人遣送回國的時候，他們非常不滿，宣稱這對他們是一種不公正而恥辱的待遇，因爲他們追隨亞歷山大遠征各地，無役不從，在體力衰竭之後，却遭受擯棄，被遣返故里，回到父母親友的圈子裏面，而他們自己則已經年華老大，疲憊殘缺，迥異當年了。所以，他們要求亞歷山大把他們全體都打發回去，當作所有的馬其頓人都已無用，因爲他現在已經有那批會跳舞的少年們，儘可帶著他們去征服世界。這些話使亞歷山大非常生氣，他在憤怒之中對他們大加責罵，然後便命令他們走開，把守衛工作交付給波斯人，從波斯人當中選出他的衛士和侍從人員。當馬其頓人看到亞歷山大被波斯人所護衛著，而他們自己則遭受排斥的時候，他們的意氣大爲消沉，大家商討一番，嫉妒和憤怒的心情促使他們發狂。

當亞歷山大率軍東征之時，原是以希臘人的統率，希臘文化傳統的捍衛者的姿態出現的，其身份及角色原本極其單純，但隨著他的帝國疆域之擴張及其所統治子民之增加，亞歷山大之身分乃由純粹希臘人之統率漸變而爲亞歷山大帝國此一廣土衆民之世界帝國之帝王，此一帝王乃各地區各民族之共同領袖而非以希臘人之統率爲已足。亞歷山大這種身份之複雜化及其所扮演的角色之多面化乃相應於大帝國之建立而不得不作之必要調整。然而，此種調整乃在希臘人以及馬其頓舊部之間引起極大之心理震撼，他們以爲亞歷山大已棄他們而去而與「野蠻人」爲伍，希臘人心理上這種怨望之氣係亞歷山大帝國之一項重要的政治問題。亞利安對亞歷山大之波斯政策在希臘人中所引起的反應有極其精彩之描寫：[59]

> 當他們聽說有關於波斯人和米提人(Medes)的種種——波斯軍官如何獲得授權；外國部隊如何納入馬其頓部隊之中；波斯衛隊如何取得馬其頓的名銜；波斯步兵如何被授以令人羨慕的衛隊頭銜；波斯銀盾隊和波斯軍（包括一支新的皇家武力

[58] *Ibid.*, pp. 850-851; 名人傳，頁二六〇。

[59] Arrian, *Anabasis*, BK. VII: 11-12, p. 365.

）如何被納入軍隊之中——的時候，他們再也不能控制他們自己了！

馬其頓舊部此種情緒上之反動，在亞歷山大衞隊的軍官卡里尼斯（Callines）所說的一段話中表現得淋漓盡致。卡氏對亞歷山大說：「……使我們傷心的是你使波斯人成爲你的親屬——波斯人被稱爲『亞歷山大的親屬』——波斯人親吻你。但至今沒有一個馬其頓人能享有這種殊榮。」[60] 據普魯塔克記載，卡氏這一段話驚醒亞歷山大，亞氏立卽召開一個據說有九千人參加之盛大宴會，所有的馬其頓人均出席坐在亞歷山大旁邊，其次是波斯人，其次是其他各族的人。亞歷山大希望藉此「重新獲得協調」[61]。

但是，帝國長程目標與短程目標相衝突之問題終亞歷山大之世終未獲得妥善之解決或消解，亞氏死後帝國之土崩瓦解業已伏因於此矣。

五、結　　論

威爾肯氏嘗云：「每一個學者都有他自己（心目中）的亞歷山大」[62]，此語誠爲確切不移之論。史學工作者爬梳史料論辨史實皆不能絕對免乎其個人生活經驗以及時代背景之投影，故宜乎亞歷山大之影像及其史實之解釋隨人而異也。本文第一節回顧學界若干研究業績，俱見亞歷山大研究成果之主觀性與時代性，可證上述看法之正確。本文對亞歷山大史事之分析乃循埃森西塔之蹊徑，取埃氏分析歷史上帝國的政治系統中政治衝突現象之若干觀點，嘗試觀察亞歷山大帝國之政策及其所引發之問題。

亞歷山大帝國之政策有二，曰：多樣形式之統一政策；曰：包容歧異之混同政策。在此二政策之下，亞歷山大在其帝國內「一」與「多」，「異」與「同」兩大極端之間力圖維持一動態之均衡。亞歷山大在十一年之間轉戰歐亞建立世界帝國，然亞氏一死其帝國隨卽分崩離析，經四十餘年之內訌之後帝國分而爲三，此又如何解釋？

據本文之分析可見，此一問題之答案早已深植於亞歷山大帝國之政治衝突之中矣。亞歷山大爲使其統一政策付諸實施，必須强調其政權之合法化乃建立於其神性之基礎之上，然愈如此强調則愈使其帝國內政權合法化與社會階層化之矛盾深刻化，終於在亞歷山大與馬其頓舊部及希臘人之間劃下一不可逾越之鴻溝，爲帝國瓦解之遠因。其次，亞歷山大爲落實其混同政策，完成其調和東西世界之長程目標，必須先完成短程目標——

---

[60] *Ibid.*, p. 365.

[61] *Ibid.*, p. 366.

[62] See: Wilcken's Preface to his *Alexander the Great*, P. xxix.威氏此意與威爾斯氏之見若合符節。威爾斯氏嘗爲 F. Schachermeyr 所著之 *Alexander der Grosse, Ingenium und Macht* 一書撰寫書評卽嘗指出：亞歷山大在各個不同學者之間各有其不同之面貌，且世間將永無一絕對性之亞歷山大影像，亦無一全盤錯誤之亞歷山大影像。（參見：C. B. Wells, review of F. Schachermeyr's *Alexander der Gross, Ingenium und Macht*, 刊於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eology*, 55, 1951, pp. 433-36.）其言不僅於亞歷山大之研究最能探驪得珠，卽對一般史學性質感興趣之研究工作者亦極具啓發性。

爭取波斯人之向心力，有效地動員帝國內一切人力物力資源，擴大帝國之政治基礎，將敵對的被征服者轉化爲帝國的支持者。但此一短程目標之完成却激起希臘人及馬其頓舊部之强烈反抗，終至危及帝國長程目標之完成，伏下亞歷山大死後帝國土崩瓦解之根本原因。

讀史至此，所謂「知人論世」，縱覽亞歷山大帝國之所以成亡興敗之紀，吾人誠不能免乎「歷史之悲情」，對亞歷山大寄予無盡之哀惋，惜其人、悲其意，而憫其力之有未逮。然則，宇宙無窮而盈虛果有數乎？湯恩比嘗撰一文題曰：「**假如亞歷山大尙在？**」[63]，雖屬遊戲文字而不失大家手筆，假設數種歷史境遇而作推論，頗能發思古之幽情，啓人遐思。亞歷山大辭世迄今已二千三百餘年，其彪炳之功業嘗引發莎士比亞筆下之哈姆雷特王子對生死問題及生命意義之反省，[64] 亞氏之父腓力王陵寢近年已爲考古發掘所得，[65] 然其人及其帝國仍爲今日乃至明日之史家提出永恒之問題：帝國如何而可以長治久安？帝國之統治者如何而可以在政權合法化與社會階層化之間取得動態之平衡？如何在帝國之長程與短程目標之間求取向心力與離心力之穩定發展以「安上而全下」（語見：賈誼，「**治安策**」）？一言以蔽之，亞歷山大帝國建立之基礎乃在於對上述問題之付予正視並力求初步解決，其瓦解則根植於上述問題之未獲澈底之解決。**中庸**第二章：「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朱註：「君子之所以爲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民國六十八年四月，於西雅圖）

---

[63] See: Arnold J. Toynbee, "If Alexander the Great Had Lived on," in his *Some problems of Greek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 47-486.

[64] Shakespear, *Hamlet*, Act V, Scene 1. 中譯本見：梁實秋譯，**哈姆雷特**（臺北：遠東圖書公司，民國五十三年），第五幕，第一景，頁一九四。

[65] 腓力王及腓力王后等之陵寢已於一九七七年十月下旬由薩羅尼卡大學（University of Thessaloniki）之考古學家 Manolis Andronicos 氏所率領之考古隊發現。截至本文寫就時，介紹此一偉大發掘者有以下三文，第三文係由 Andronicos 氏親自執筆，最稱信實詳贍：

(1) Nicholas and Joean Gage. "Treasures From a Golden Tomb,"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Dec., 25, 1977), pp. 14-19 and p. 32.

(2) "The Treasures of Philip's Golden Tomb," *The Sunday Times Magazine* (Feb., 5, 1978), pp. 26-36.

(3) Manolis Andronicos, "Regal Treasures from a Macedonian Tomb,"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 Vol. 154, No. 1 (July, 1978), pp. 55-7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